

重新揭示建筑意义的潜在维度：《分裂的再现时代中的建筑》与达利伯·韦瑟利的建筑现象学——阐释学思想

Rediscovering the Latent Dimensions of Meaning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Divided Representation* and Dalibor Vesely's Architectural Phenomenology - Hermeneutics^① Thinking

何星宇 | HE Xingyu 王凯 | WANG Kai

中图分类号: TU-0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2024)01-0117-08 DOI: 10.12285/jzs.20221021001

摘要: 本文以达利伯·韦瑟利唯一的专著《分裂的再现时代中的建筑》为线索, 评述他的建筑现象学—阐释学思想的内容、背景和瑕瑜。他从建筑再现和其在现代性之下面临的意义交流的危机出发, 用现象学和阐释学哲学视角揭示了建筑再现交流所依赖的潜在维度和它的历史转变, 并提出基于“碎片”和“诗学”的出路。他对建筑危机的讨论是1970年代英国反思现代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和延续。对危机的关切使他的思想比其他的建筑现象学更广博深厚, 为体验问题提供了公共和历史基础。韦瑟利对建筑意义潜在维度的重新发掘展现了“再现”的危机在认识论和历史叙事上的两种层次, 既是了解欧洲建筑文化精神内核的捷径, 也为建筑实践提供了更加公共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达利伯·韦瑟利、建筑现象学、阐释学、建筑再现、现代性危机

Abstract: Using Dalibor Vesely's only monograph as a clu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on his thinking about architectural phenomenology and hermeneutics. He starts from architec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its crisis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hadow of modernity, uses the lens of phenomenology and hermeneutics philosophy to reveal the latent dimension on which the communication of architecture relies and it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poses "fragment" and "poetics" as ways out. His engagement with architectural crisis belonged to and continued the trend of reflecting on modernism in 1970s UK, which makes his discourse more profound than other architectural phenomenology, providing a common and historic basis for the question of experience. Vesely's thinking reveals the epistemological and historical levels about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offering both a shortcut to the spiritual core of European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an insight to a more public-oriented architectural practice.

Keywords: Dalibor Vesely, Architectural 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Architectural representation, Crisis of modernity

作者:

何星宇,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硕士,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Zürich) 建筑学硕士;
王凯 (通讯作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录用日期: 2023-05

围绕体验、场所、氛围等主题的讨论, 现象学一直是建筑文化研究中重要的视角。近期因德国现象学家格诺特·柏梅 (Gernot Böhme) 逝世而举行的纪念活动也让现象学再次引起关注。长久以来, 提起建筑现象学首先被想到的总是建筑历史理论学者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兹 (Christian Norberg-Schulz)、建筑师斯蒂芬·霍尔 (Steven Holl) 等人^②。学者戴维·莱瑟巴罗

(David Leatherbarrow) 和阿尔伯托·佩雷兹-戈麦兹 (Alberto Pérez-Gómez) 近年活跃于国内学术圈^③。而他们的老师, 作为建筑现象学话语中重要一脉的捷克裔的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者、建筑教育家达利伯·韦瑟利 (Dalibor Vesely) (1934—2015) 以及所代表的阐释学派建筑现象学, 尽管在英语学术圈突出的地位, 他在国内较少为人所知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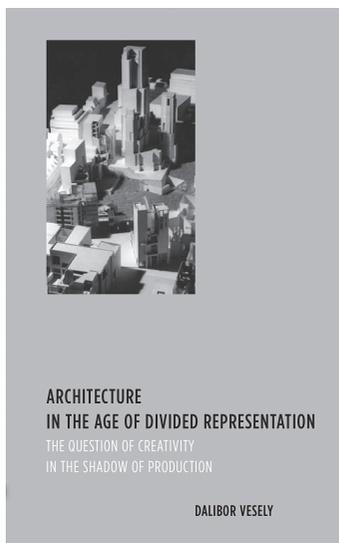


图1:《分裂的再现时代中的建筑》封面

韦瑟利在英语世界有着经久和持续的影响力。去年九月底新出版了由韦瑟利的学生和同事所编撰的他的选文集《建筑的潜在世界》^④ (*The Latent World of Architecture: Selected Essays*), 将韦瑟利的思想话语再次拉回学术讨论的核心视野中^⑤。值得注意的是, 这本文集在很大程度上是韦瑟利在2004年所出版的《分裂的再现时代中的建筑——在生产阴影笼罩下的创造力问题》(*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Divided Representation: The Question of Creativity in the Shadow of Production*) (以下简称《分裂再现》) 一书的回响。这点除了体现在韦瑟利坚守建筑现象学—阐释学的方法和立场, 还在于受到阐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的影响, 他在写作时并不避讳复用之前文章的文字^⑥。甚至可以说, 文集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能在《分裂再现》中找到对应的议题乃至重复的段落。如果文集中的文章受限于篇幅和文体, 是对特定的主题的重点展开, 像是枝杈和叶子, 《分裂再现》则提供了全局和连贯的主干 (图1)。

韦瑟利本人和他的《分裂再现》都显得很特别。他由始至终都只专注于将现象学和阐释学哲学的方法引入建筑学讨论, 《分裂再现》是他在晚年所出版的

集大成的著作, 也是毕生唯一的专著。所以韦瑟利和这本书可谓一体两面, 书更像是他的一本个人思想的自传。《分裂再现》无疑是了解韦瑟利乃至整个阐释学派建筑现象学思想和方法的核心文本。该书内容广博、思辨深厚, 其主要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建筑意义潜在的维度: 这一维度既有空间上的广度, 联系了个体体验与整体的文化环境; 也有着时间上的深度, 可以作为把握近现代欧洲建筑乃至宏观文化和技术领域变革主体脉络的读本。

韦瑟利的思想以及作为其核心的这本专著国内学术界虽然有阅读^⑦, 尚无详尽的研究。然而在某种程度上, 阐释学派建筑现象学或许是一种更加完备的建筑现象学, 能为当下建筑学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启示和指引。在此基础上韦瑟利的思想和这本书也为现当代建筑寻求一种意义的共识提供了风向标, 对它的引入和讨论十分必要。

一、《分裂再现》成书背景及阐释学派建筑现象学的核心议题

韦瑟利酝酿他的思想和《分裂再现》一书跨越了东西欧地域背景和漫长的时间维度。他早年成长和求学于战后红色政权影响下的布拉格, 拥有工程学和建筑学的双重教育背景。在求学期间通过参加捷克现象学家雅恩·帕托什卡 (Jan Patočka) 的地下研讨班接触到了现象学和阐释学, 并以此作为反思建筑学问题的武器^⑧。1968年布拉格之春失败后, 他永久移居伦敦, 先后在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和建筑联盟学院以及剑桥大学任教, 围绕他与教学搭档约瑟夫·里克沃特 (Josef Rykwert)^⑨、彼得·卡尔 (Peter Carl)^⑩ 以及他们的学生形成了或称埃塞克斯学派的建筑阐释学派^⑪。韦瑟利并不是一位多产的学者, 他在将现象学和阐释学哲学的视野引入建筑历史理论和设计教学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 并汇聚到

写作。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和打磨^⑫, 直到2004年他被期待已久的专著才终于问世。

如此积淀之下, 韦瑟利的思想和这本书并不容易理解。建筑现象学关注建筑体验的问题, 而韦瑟利一派的建筑现象学的特点是在此基础上与阐释学哲学的缠结。阐释学视角下的建筑现象学有两点很重要: 语言媒介与交流问题在文化中的根本地位, 以及它的历史维度。由此也将建筑学意义的问题引向了更加深层和公共的讨论。

阐释学的这两个关切点也反映在了《分裂再现》的题目中: 韦瑟利认为建筑意义的问题是“再现” (representation) 的问题。所谓再现, 指的是在象征关系中将内在的、不可见的意义借由外在的、可见的语言符号或是象征物来呈现。当韦瑟利将建筑归为再现的一种, 也就将建筑纳入对广义语言的讨论。“分裂”以及“阴影”暗示了建筑学所面临的危机。韦瑟利指出当代建筑的问题是它们在与公众交流的失效。这种失效源于两方面: 当下建筑学科过分推崇技术指标而忽视了建筑的人文价值; 建筑师过于注重个人表达和差异性, 把建筑当成了艺术创作。如果我们身处再现业已分裂的时代, 就意味着曾有过再现综合的时代, 由此韦瑟利也引出了危机的历史性。

建筑的交流性问题和在此基础上面临的危机成为了贯穿《分裂再现》一书的线索。该书主要由八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为导引, 是韦瑟利对现代性问题下建筑学所面临困境的综合诊断, 并用再现的主题限定了全书讨论建筑意义的框架。第二章“交流性空间的本质”以莫里斯·梅洛-庞蒂式的视角揭示了再现意义的根本来源和交流所依赖的隐含基础。第三章到第六章是对再现问题具体的历史分析, 勾勒了它在历史中的转变过程, 第六章对“技术”主题进行了专门的剖析和批判。最后两章分别从“碎片” (fragment) 和“诗学” (poetics) 主题出发, 尝试为建筑学在现代性危机中提供出路。

二、《分裂再现》内容综述：发掘建筑再现的潜在维度

在《分裂再现》的开篇，韦瑟利借由对比两种不同的再现来勾勒建筑学面临的困境：一种是传统所对应的“参与性再现”（participatory representation）。“再现”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自然产生，而且能被理解和融入环境中，实现对原有秩序的延续。另一种是在现代性思维影响下的，脱离了原本的语境的“解离性再现”（emancipatory representation）。在这里“再现”的形式被赋予了固有的意义，但却常常无法被公众所理解。

“解离性再现”具体来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工具性再现”（instrumental representation）。韦瑟利在此继承了现象学哲学对于主、客观分离的批判：现代性来自于对一种抽象、还原的知识追求，试图借由科学对现实世界的量化确立一种清晰、独立却又普世适用的知识，从而成为一种万能的工具。但是这一过程伴随着对现实的过度简化；并且与强调参与和创造的传统式再现不同，它导向了一种只遵循自己的内在逻辑、无视场所和文化区别的同质化生产。比如铁路和电视塔造成的难以理解的城市景观。

与之对照的是在艺术领域常见的“审美性再现”（aesthetic representation）。它来源于现代性还原过程中的残余，无法被技术和理论所解释的主观领域。它把个体的体验和判断作为衡量意义的标准，把基于天赋和直觉的自由创作作为新的范式，但也带来了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如许多艺术家和明星建筑师的“自我重复”。这两种再现之间的相离正是书名所提的分裂的再现。

在第二章，韦瑟利结合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和阐释学哲学的视角，揭示“参与性再现”的根本地位以及它所依赖的潜在维度。他引用了一系列的感知研究案例来揭示知觉的可变性^⑭，打破了人和环境是主客二分的固有观念，指出两者实际被连续的媒介网络联系在一起。韦瑟利

用一对概念解释其来源：与具体性和基本知觉体验对应的“具身”（embodiment），以及代表了高级抽象关联能力和表达性的“联结/表达”（articulation）^⑮。从“具身”到“联结/表达”的过程伴随着语言的使用和形成，也将体验与文化环境联系起来。随着时间推移，稳定的形象和广义的语言，如几何、基于肢体语言的仪式，被用于指代和归纳实践中丰富却偶然的个例和现象，由此形成代表了生活中典型场景和事物的“情境”（situation）和象征物。前语言的知觉体验和高级抽象的象征符号组成了整个媒介网络，意义借由想象和关联作用在不同层级间传递，于是建筑师才能用简单草图代表复杂和丰富的建筑要素。

这个连续的网络充当了文化生活中的基本参照，但我们往往只能察觉和专注于直接可见、可感的部分，误以为这部分的意义是自足而独立的，“解离性再现”也由此产生。以街头咖啡馆为例，它的外在的形态、材料和家具陈设等并非其全部，相关的文学、电影、绘画等艺术作品也在帮助塑造咖啡馆成为一种典型的情境，更加本质的部分隐藏在相关的社会文化参考的领域中。体验和环境在此隐含维度中纠缠和重叠在一起，它无法被逻辑思维清晰把握，属于意识的前反射（pre-reflective）领域，不同的感官也在此相互关联，在整体文化环境中则对应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⑯。这一潜在层次是始终在场的，人与所处的环境这种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的循环关系和状态被韦瑟利称为“交流运动”（communicative movement）^⑰。由此也引出了一种不同的认识论：人无法在理性上完全把握和超越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只能在与后者的对话和交互中接近它的本质。传统和秩序不是某种固定的价值和标准，而是需要被不断地检验和阐释。对潜在文化维度的依赖虽然是再现中始终存在的一种限制，但也因体验者都以此为参照，交流和共识才得以可能。相比于其他的再现形式，建筑经久，体验直接，综合包容能够作为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的载

体和场所并且与之发生联系。这让它在促进整体文化空间的建构、再现实践秩序和延续传统方面更加具有优势。

从第三章到第五章，韦瑟利勾勒了建筑乃至广义上所有的艺术如何逐步走向分裂的“解离性再现”，即危机产生的历史过程。整个线索以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透视化”（perspectivation）为开端——在光学、神学、几何学和透视学和绘画等学科的综合之中表现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论的趋势：试图摆脱外在复杂的世界，而探究和专注于从世界中抽离出来的理想化的图景。这一点成为了主客二分的笛卡尔主义（Cartesianism）的前身和现代性的起源。之后的巴洛克时代延续和加强了这种趋势，艺术家、科学家和建筑师试图把传统的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新兴的科学再现工具相协调，呈现出一种新旧理念并存的过渡状态。到了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随着牛顿综合理论（Newtonian synthesis）的影响下，整体的生活世界终于被一分为二，技术和艺术分别走向工具理性和审美表达的两极，建筑则受困于两者之间。韦瑟利指出工具性和审美性背后有着相似的动因——“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但在他的分析里这种意志不依托于具体社会阶级、政治环境和经济动因，只是关于形而上学，因而是笼统的。他旨在强调在前启蒙时代各种学科密切相关、共同追求统一的秩序和理念的传统。但韦瑟利分析也是深刻的，在对历史线索的回溯重新揭示了很多概念原初的意义：例如透视、比例原本强调的是事物间的类比关联性而非几何尺度上的量度。装饰并非只是一种审美趣味，而是对宇宙秩序的一种再现手段等^⑱。

韦瑟利认为如日中天的技术性思维是文化和建筑学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对技术的批判和反思成为他思想的核心一环。他在第六章试图拓展技术的意义、跳出只在技术中谈技术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他在历史回溯中还原了技术的最初的含义——“技艺”（techné），技术和艺术原为一体。但是技艺本身也潜藏着从理解现实到企图

主宰现实一步之遥的危险¹⁸，这种趋势将技艺在历史进程中推向了后来狭义的、试图将世界全盘量化并加以控制的“技术”（technique），呼应了之前章节所揭示的认识论限制和历史危机叙事。另一方面，韦瑟利在更加现代的语境中通过对比不成功的技术系统和成功融于文化中的技术系统——后者以埃菲尔铁塔为例，从一开始的异物，在时间和各种艺术作品的帮助下最终成为了巴黎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指出了联结技术和更大的文化语境的重要性。

如果建筑危机源于对其潜在维度的忽视和遗忘，韦瑟利在《分裂再现》的最后两章依此提出了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利用“碎片”。碎片打破了从属对象的形式和严格定义的束缚，在承载原本意义的同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和阅读的可能。借由基于前反射维度的隐喻、类比和象征作用，碎片引来开放和自由的阐释，由此能获得比基于因果关系和理性建构的封闭体系更加丰富的意义。另一条出路重申了建筑应该作为一种“参与性再现”、承担公共交流的任务。韦瑟利将这一点统合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传统下，提出走向一种诗性的建筑：在古希腊语中，诗学原本代表的是关于制作（poiesis-making）的技艺（techne），它是对人的实践的摹仿（mimesis）。韦瑟利区分了摹仿和模仿（imitation）：前者是一种开放和辩证的诠释，包含了创新的维度，而模仿是一种不假思索的复制，对应重复性的生产行为。韦瑟利强调“制作”是对人的实践的摹仿而非对自然秩序的直接模仿，指出了人的认识的条件性，从而将阐释学式的认识论中的张力和潜力——即由诠释者和诠释对象间不可克服的距离，和“误读”可能带来的创新维度——整合进了摹仿的概念之中。技艺制作对应了再现的主题，强调了技术、艺术同源的传统，从而试图弥合在历史过程中审美性再现和工具性再现的分离。摹仿制作中统合了阐释学在不断阐发、继承与创造并行的过程中把握真理和秩序的态度。具有诗性的建筑即是能够延

续既有的文化情境，并且能回应当下条件进行更新和创造的建筑。值得注意的是韦瑟利努力避免直接使用阐释学和现象学哲学较为晦涩、深奥的概念，而试图通过转译、与其他概念整合让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更加适应建筑学的语境¹⁹。

通过《分裂再现》，韦瑟利试图重新揭示建筑意义的潜在维度和引起对它的关注。他频繁使用“潜在”（latent）一词，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他也更偏好称其为“潜在世界”。“潜在”的重要性在韦瑟利的思想中自然不言而喻，新出版的选文集也以之为标题。在他看来，再现的交流性和对潜在维度的依赖是一体两面的²⁰。现代性进程在追求客观知识的过程中将建筑逐渐推向简单的、只基于技术指标或个人风格的重复生产，也使其失去了与所处的文化环境交流的能力。因此韦瑟利通过揭示建筑体验所依赖的文化参考和媒介网络，将意识和环境联系在一起，恢复了建筑意义的广度。而在此基础上，他回顾历史既是揭示转变的过程，也是为了发掘诸多的建筑概念原本丰富的含义，重新确立其在时间维度上的深度。“潜在”对应了在文化环境中隐含而又无处不在的常识，为建筑提供了重要参考，它虽非像科学和技术的理论知识那样透明客观，但也不意味着可以肆意和专断。它具有自身的结构，然而又是暧昧、模糊的。从此意义上，不难理解为何韦瑟利强调建筑设计是一种 articulation，与它英语中双重含义呼应，它是一个与文化环境建立连接，同时也是将其中存在的可能性加以发掘、具体化和表达的过程。

三、韦瑟利与其建筑现象学—阐释学思想的历史位置

虽然韦瑟利的《分裂再现》于2004年才出版，实际上讨论建筑学危机的高峰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建立在对现代主义建筑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动荡的反思之上：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断言现代主义建筑的式微

源于无法与公众在意义上达成共识。他从符号学出发，也将建筑的主要问题归结于交流问题²¹。肯尼思·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则被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所启发，悲观地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基础上并不能导向解放而只是带来同质化的生产，将“建筑”（architecture）变成了批量生产的“楼房”（building）²²。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是这一反思中的三股主要力量，并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²³。韦瑟利本人在移居英国后也开始积极阅读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的文本，吸收其术语，并且和弗兰姆普敦有密切的来往和交流²⁴。在众人的反思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对建筑学领域冰冷、同质的技术生产的批判和对人文主义的重新关切，它所对抗的是技术官僚主导着整个建筑学科的价值取向和教育培养的状况。

不过如果詹克斯、弗兰姆普敦等人的讨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英国的即时反应，韦瑟利则认为这种危机有着更加深远的源头和长远的影响，以至于30年后出版的《分裂再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的核心框架。这点源于他对危机深刻的体悟：先是目睹在极权主义主张的官方建筑风格和布拉格城市实际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割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参加了帕托什卡的地下研讨班，接触到了现象学。帕托什卡师承胡塞尔，从胡塞尔开始，现象学哲学就以“回到事物本身”的主张试图扭转被技术理性所异化的文化现实，同时它也是胡塞尔和帕托什卡两人反抗强权的思想武器²⁵。然而当韦瑟利来到铁幕另一边的世界，却发现伦敦和布拉格并无本质的区别。二战后以来一系列大规模、由上至下的规划法案²⁶和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政策先后主导的开发建设让城市环境变得越发支离破碎。建筑教育也以技术科研和技能训练为先，导致韦瑟利先后试图在埃塞克斯和剑桥推行的

更为人文主义导向的建筑教学一直举步维艰。跨越数十年的时间维度、东西方阵营的体验让他更加确信这种文化危机的普世性。因此他提供的是一种宏大的批判，像他的老师一样，试图从欧洲最深远的文化内核挖掘建筑学的意义问题根源。韦瑟利的思想中现象学和建筑学是相辅相成的，建筑学既是这一宏大的文化危机中的一部分，但他也坚信建筑在缓解文化危机上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使命。

面对危机，詹克斯、弗兰姆普敦和韦瑟利分别提出了向度不同而互补的出路，以追求一种更具公共基础和“诚实”的建筑：詹克斯向“下”看，寄希望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建筑，通过其具有的多义性来联结大众与精英、过去和当下；弗兰姆普敦向“外”看，提出“批判性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²²，试图跳出现代主义的独白和主线叙事，在长久以来被忽略的其他文化地域中找到和环境或场所紧密联系的建筑表达；韦瑟利则向“后”看，以前现代，或者尚未被技术理性扭曲仍存在于欧洲老城中的传统和情境为典范，“诗性建筑”应该在延续这一典范的同时做出创造性的再诠释，在同与异之间取得平衡。

而在方法上，韦瑟利提出利用“碎片”和詹克斯的“局部独立主义”（ad-hocism）²³不谋而合。两人都受到了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启发，将拼贴、并置作为拓展和发掘意义的手段，但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碎片有所分歧。詹克斯认为建筑本身可以由碎片组成，各部分因地制宜地满足特定的设计和使用需要，而不必在形式上连续统一。这让建筑更加诚实、可读，更重要的是迎合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下项目通常预算有限、工期紧迫的条件。他也拥抱解构主义和新兴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为建筑带来的不定形、碎片化的形式，因为它带来了多重解读和意义投射的可能²⁴。韦瑟利则始终与潮流保持距离，对解构主义建筑持消极态度，认为它和极少主义艺术、抽象艺术一样属于审美独白。对于如何具体地在建筑实践中使用

碎片，他秉持暧昧和开放的态度：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贝斯特居伊（Beistegui）公寓屋顶平台可以作为不充分的例子²⁵，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指名任何的当代建筑范例，只是以自己在剑桥领导的设计课教学斯皮特尔菲尔兹（Spitalfields）课题和散布在《分裂再现》全书中学生的隐喻性的拼贴练习作为引子。由此看来，韦瑟利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把握情境或传达建筑意义的方法，而非就字面意义上用碎片构成建筑。

对建筑意义公共性的讨论和危机的关切是韦瑟利的建筑现象学—阐释学的基本出发点，也将他与其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建筑现象学区分，并揭示后者存在的一些问题。以诺伯舒兹和霍尔为例，他们主张的是一种经过简化的、建筑师式的现象学。此种建筑现象学有意弱化甚至完全省略对历史文脉的讨论，而止步于感性和直觉式的分析，但是却无法回答如何确保个体间的感性和直觉具有共性。讨论不同感官对建筑的体验影响也只流于表面的描述，而不能进一步地解释其内在协同的原因²⁶。事实上，这种脱离了历史和危机意识、只强调主体感受和直接体验的现象学正是落入了韦瑟利批判的审美相对性的陷阱中，并且加剧了建筑的交流问题。这一点和未经历阐释学转向的现象学的不足是一致的²⁷。韦瑟利通过将体验与再现、语言问题关联起来，揭示了感受背后的意识、历史和文化基础，从而为体验确立了公共的维度。

阐释学派的其他学者，以韦瑟利的学生佩雷兹-戈麦兹和莱瑟巴罗为代表，两人身上尤其能看到韦瑟利的影响和他探讨问题的继承和拓展。佩雷兹-戈麦兹由博士论文改写的首本专著《建筑学与现代科学危机》是《分裂再现》一书的预演，他之后的几本探讨透视、体验和爱-公共性、氛围等主题的著作中也延续了现象学—阐释学话语的历史深度。莱瑟巴罗则继续扩大了这一话语的广度，但是更加以建筑师为其受众，将建筑置于自然景观和文化环境中重新反思具体的建筑问题，如

建筑的折旧、地形、表皮等。阐释学派的话语和书以深奥、广博著称。追根溯源，韦瑟利的思想是把握这一学派理论和方法的关键。

四、《分裂再现》的价值与局限

《分裂再现》从2004年出版至今已过了快20年，对于我们来说，这本书似乎已经有一定的文化和时间距离。结合韦瑟利思想的背景并纵观《分裂再现》全书的内容，他对建筑再现潜在维度的重新发掘展现了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危机的两种层次，区分这两种层次有助于理解本书对于当下的价值和局限。

一方面，阐释学视角了揭示一种始终在场的弱的、隐含的危机，即个人体验和文化环境在语言媒介的关联和约束下导致再现和认识论上固有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强的、可感的危机，体现在现代性思维推动下再现分裂的历史过程和影响。韦瑟利自己处于两种危机的张力之间，因此他的语言和立场有时会有些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让他深感再现的历史危机对文化的撕裂，急迫地呼吁弥合，对技术特别地保持审慎和怀疑；然而阐释学和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又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种固有的认识论限制，这种危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韦瑟利自己后来也与“危机”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并且相信文化环境本身的自愈能力。这点体现在《分裂再现》中斯皮特尔菲尔兹课题最后在历史街区和新建的商业办公楼之间留白的公共花园，期盼时间维度和公共参与最终能够调解两者之间的冲突。韦瑟利以此模型照片作为《分裂再现》的封面，也表明了他的某种结论性的态度。

如今从“强”危机的一面来看，韦瑟利指出的分裂再现的问题依然存在，时间的洗礼反而进一步地确证了韦瑟利洞见深刻。他对工具性和审美性再现批判的框架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当下诸如大数据、低碳建筑等概念主导的设计，以及各种“网红”建筑时保持清醒，意识到技术

指标和标新立异的形式并不能确保能够融入文化环境的好建筑。另外，韦瑟利对建筑再现问题的“强”危机分析立足于欧洲的文化史及近现代转变，其中涉及的光与神圣智性、透视化、巴洛克教堂的装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等都属于欧洲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和深层的命题。对于在欧洲文化语境中实践的建筑师以及研究者来说，韦瑟利提供的这条宏大、深刻的线索无疑是一条了解这些问题的“捷径”。

不过这也成为本书的局限所在。如所有建构性的理论，形而上学推动的这种宏大叙事在追求共性的同时往往难以兼顾对特定的历史复杂性的辨析和批判。当韦瑟利将中欧传统城市和建筑作为象征再现的理想范例，却模糊了这一主体的地域性而假定了它某种普世价值，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印象。对于在非欧洲文化语境实践建筑师来说，这些例证或许只能提供间接的启发。

因此，本书揭示的与“强”互补的另一条“弱”危机的线索尤为重要：建筑再现作为一种媒介，其意义依托于特定的文化场域，并且在公共参与和交流过程中被确立和更新，情境可以作为实践的主要依据和参照。只是由于情境总是具体、因时代和文化环境而异，所以没有固定的方法论可循。本书目的主要在于阐发，而且韦瑟利自己也缺乏直接的建筑实践经验，对于当代建筑可以如何利用碎片、体现诗性，他无意提供特别明确的范例^③，特别是能被建筑师直接利用的方法，这也是基于他对限定固有价值批判。结果看来会显得韦瑟利将目光过多地倾注于过去的历史和传统，对当下问题和困境的讨论缺乏具体性和针对性。

但本书也由此指明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韦瑟利展现建筑再现的“强”危机来源于现象学—阐释学哲学分析展现的语言媒介和认识论的张力之上，前者可以看做后者这一“弱”危机的例证和外表现。除去韦瑟利基于欧洲文化和城市的例证和讨论，再现和依赖的隐含维度的问题框架在我们的语境中依然是

有启发性和适用性的，只是需要在我们自身的文化和当前的时代条件中进行重新演绎。如果我们也一定程度受制于工具性和审美性二分再现的困境，那么有待完成的便是去回溯我们自己再现分裂的历史进程，明确传统再现的基础和能够作为建筑实践中参照范式的情境。我们与《分裂再现》的时间和文化距离并非是一种劣势，而是实现阐释学阐发和“摹仿”的必要条件。

五、结论

韦瑟利集生涯之大成的《分裂再现》虽然有个人和时代印记，但经由漫长的时间酝酿而成，因此有着深刻的洞见和长远的价值，至今仍然被不断地提起。韦瑟利所代表的阐释学派建筑现象学是对建筑现象学领域必不可少的补充，揭示出的建筑意义的潜在维度对于研究者和建筑师都有所裨益。它为了解西方近现代文化转变脉络和建筑学意义问题的根源提供了一条宏大而深刻的线索，也为我们反思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和建筑学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参考和对照，提供一种人文主义的熏陶和价值观的拓展。它可以让建筑师意识到基于量化的经济效益（经济权力）或者是建筑师自身的表达欲望（创作权力）的“权力的建筑”的局限性，为自己的建筑更加能够融入文化环境、与公众建立有效的交流提供指引。

[致谢：本文脱胎于由王凯指导何星宇2020年于同济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达利伯·韦瑟利的建筑现象学思想及教学实践》和后续由卢永毅主持关于《分裂的再现时代中的建筑》一书的专题读书会讨论。由衷感谢卢永毅、冯仕达和水雁飞在读书会中的点拨以及王雨林在成文过程中的帮助。]

注释

① 对于 Hermeneutics，目前学界同时存在解释学、诠释学、阐释学三种翻译，在此笔者偏向于使用“阐释学”。该译名中的“阐”更具语义开放性和丰富性，

强调了“阐发”的作用。不仅限于对现有文本的阅读，而是在阅读中促进新的认识。这与韦瑟利强调再现中参与性和创造性并行是一致的。对于三种翻译的分析，可参考孙周兴：《试论一种总体阐释学的任务》[J]，《哲学研究》，2020（4）：20-27。

② 诺伯舒兹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和霍尔的作品集《锚》在2010年就被翻译引进。诺伯舒兹的场所精神（genius-loci）概念尤其被广泛用于分析和讨论建筑案例。

③ 两位学者的著作在近年被陆续翻译引进。如莱瑟巴罗的《表面建筑》（与莫斯塔法维合著，史永高译）、《地形学故事：景观与建筑研究》（刘东洋、陈洁萍译）；佩雷兹-戈麦兹的《建筑在爱之上》（邹晖译），他由博士论文改写成的首本专著《建筑学与现代科学危机》最近由王昕和虞刚翻译出版，和本文讨论的《分裂的再现时代中的建筑》有着相似的脉络和主题。此外，莱瑟巴罗在退休后从2017年起受聘并执教于东南大学，定期组织和举行学术讲座。佩雷兹-戈麦兹近年也多次到国内进行学术交流。

④ Vesely D. The Latent World of Architecture: Selected Essays [C]. Stara A, Carl P, ed. Taylor & Francis, 2022.

⑤ 该选文集收录和整合的主要是韦瑟利在出版《分裂再现》一书之后发表的文章或者章节，少数为之前，仅有一篇先前从未发表，但讨论的关于“碎片”的话题在别处已有涉及。刊载的这些文章的书和期刊，或已绝版，或为捷克学刊，不易获得。编者结合韦瑟利档案馆的资料对文章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和加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韦瑟利原本的意图。

⑥ 伽达默尔认为读者在第一次看到文本时并不总能把握文本的完整含义。韦瑟利以此重申这些讨论的重要性并且提供更加大的参考框架。

⑦ 国内建筑学术界这本书最早由冯仕达组织的内部读书会引入和阅读。2015年本书的导引章节经由张博远翻译刊载于《时代建筑》。参见达利博·韦瑟利，张博远：《现代性与再现的问题》[J]，《时代建筑》，2015（05）。

⑧ 韦瑟利于1967年为米歇尔·拉贡（Michel Ragon）《明日何处栖居？》（*Ou Vivrons-Nous Demain?*）的捷克语译本写后记，这是他最早用现象学的视角批判建筑学中技术理性的排他性和异化、号召重新关注原本“自然世界”维度的文本。见 Vesely D. Doslov[M]. //Ragon M. Kde Budeme Zit Zitra. Smetanova V, Fronta M, trans. 1967: 159-171.

⑨ 1968年里克沃特在埃塞克斯大学开设历史上第一个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的文学硕士学位课程，邀请了韦瑟利一起主持项目并开设研讨课。两人的研讨课形成互补的关系，里克沃特专注于建筑历史，韦瑟利则偏重哲学。里克沃特秉持和韦瑟利相同的立场，批判战后欧洲重建过分偏重于技术和工具性，而强调将人性、情感注入城市与建筑的必要性，探寻历史传统和意义。他质疑主流的历史叙事，如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亚当之家：建筑历史中关于原始棚屋的思考》（*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中指出原始棚屋不过是为了支持某一时期的特定理念所反向构建的产物。里克沃特对历史的研究方式是人类学式的，通过从根源上对历史中细枝末节进行重新审视，崩解

了主流虚假的历史建构。因此历史在他的写作中常以一种非线性的、碎片化的叙述和事实的方式被呈现。

⑩ 由于其人文主义的导向与主流强调建筑师职业技能培养的路线相悖，埃塞克斯的项目遭遇压力而被迫终止。从1978年开始，在罗宾·米德尔顿 (Robin Middleton) 的邀请下，韦瑟利开始全职在剑桥任教，聘请卡尔作为他在剑桥的教学伙伴，而非继续与里克沃特合作。这与韦瑟利将重心转向了探索如何将哲学和历史的视角应用到建筑设计领域相关。早在埃塞克斯期间，韦瑟利就已同时在建筑联盟学院指导设计课教学。但是物理空间上的分离使理论和设计教学始终无法结合，直到在剑桥才得以有机会探索两者的协同关系。韦瑟利在剑桥开始以主持设计课为主，历史教学则以非正式的私人研讨课的方式进行，直到1985年后设立和埃塞克斯相似的哲学硕士项目才有了更为正式的形式。卡尔毕业于普林斯顿，与韦瑟利于1975年肯塔基大学威尼斯暑期学校中相识，两人都对探索哲学和历史与建筑设计之间关联有浓厚兴趣。相比之下卡尔在设计方面接受过更为系统的训练，有更加敏锐的直觉。卡尔在韦瑟利剑桥设计课的教学组织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同时也负责建筑史讲座和指导硕士博士论文，在韦瑟利退休后接替了他的位置。然而，卡尔公开出版的论文极少，他的文本大多只在内部流通，也没有独立专著。

⑪ 韦瑟利，里克沃特和卡尔的学生中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建筑师。包括佩雷兹-戈麦兹、莱瑟巴罗、罗宾·埃文斯 (Robin Evans)、丹尼尔·里伯斯金 (Daniel Libeskind)、莫森·莫斯塔法维 (Mohsen Mostafavi) (埃塞克斯)，埃里克·佩里 (Eric Parry) (AA)，帕特里克·林奇 (Patrick Lynch) (剑桥) 等。

⑫ 韦瑟利在2004年以前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本，许多都经过整合、改写，成为《分裂再现》的一部分。例如：本书关于碎片的第七章对应 Vesely D. Architecture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Fragment[M]. // Middleton R, Boyarsky A, ed. The Idea of the City: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s. Londo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1996: 108-22; 第六章章节中对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讨论对应 Vesely D. Space, Simulation and Disembodiment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J]. OASE, 2002 (58): 59-73. 第五章对应 Vesely D. Architecture and the Conflict of Representation[J]. Aa Files, 1985 (8): 21-38.

⑬ 在颠倒眼镜实验中，旧有的身体触觉和被反转后的视觉刚开始相互冲突，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协调。甚至在摘下颠倒眼镜后，新建立的视触觉模式依然留存有一定惯性。再有先天失明者通过手术获得视觉的案例。患者在术后短期内反馈说视觉像是无意义的杂音，只有利用触觉作为基础参照并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新的视觉体验才与旧的感知关联起来。Vesely D.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Divided Representation: The Question of Creativity in the Shadow of Production[M]. MIT Press, 2004: 46-56.

⑭ “具身”的概念引自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一方面代表了体验中身体所感知到的最为具体、丰富的要素；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人对这种具体性的依赖，在感官剥夺实验里人的意识无法独立于外界环境存在，需要来自环境的体验和刺激才能加以维持。“联结/表达”需要结合 articulate 在英语中的双重含义和具

体的语境来理解：一方面，它意指关节的连接和咬合，对应了意识在低级的体验感知基础上进行整合、归纳和联系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表意为清晰地说出，即用概念指代这种整合和联系的结果，对应了与体验相对的表达性，也就是再现的层面。

⑮ 无法被理性完全把握的潜在世界，对应了现象学中被“悬置”(epoché)、存而不论的领域，早期的胡塞尔现象学和以海德格尔为分水岭的、经历了阐释学转向的现象学的差异在于，被悬置的领域是否能对“直观”(intuition) 产生影响。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中的“肉身”(flesh) 的概念、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中悄然运行的“存在理解”(Seinsverständnis) 对认识“存在”(Sein) 的影响、强调“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 的阐释学循环 (hermeneutic circle)，三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认识主体和对象受到了认识媒介的制约而纠缠在一起，所以无法通过超脱的笛尔式的“我思”(cogito) 通达绝对澄明知识，因而否定了任何再现具有固有的意义。韦瑟利也曾简单地讨论过这一转向、现象学和阐释学的谱系关系以及它们对建筑学的意义，参见 Vesely D. Architecture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M]. // The Humanitie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Bandyopadhyay S, et al., ed. Routledge, 2010: 211-222.

不过为了更好地适应建筑学语境，回应建筑学更加关注的身体、感知等主题，韦瑟利采用了知觉现象学的视角和建筑领域的例子，来对现象学、阐释学的概念进行了替换、转译。韦瑟利也批判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过于追求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而忽略了与实际生活语境更加相关的身体性的议题。参见 Vesely D. The Latent Ground of the Natural World: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cative role of architecture[C] HK Heritage Museum, 2005.

⑯ “交流运动”无疑是对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阐释学循环”的转译和扩展。只是这里的循环不再局限于认识和解文本、诠释者和诠释对象，而是进一步扩大到人和他所处的环境。

⑰ 巴洛克艺术中常见的灰泥饰跨越绘画、雕塑、建筑等不同的艺术的边界，并把它们联系起来，成为媒介和交流性的化身。装饰 (decoration, decor) 的原初意义和 ornament 紧密关联，源自希腊词 kosmos 的拉丁文翻译，意指自然世界的秩序。Vesely D.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Divided Representation: The Question of Creativity in the Shadow of Production[M]. MIT Press, 2004: 93-95, 223-226.

⑱ 技艺的这种特质体现在它与“魔法”(magic) 以及“模型”(model) 的关联。传统的仪式是一种对自然规律和恒常性的文化记忆，它的功效体现在它能对应现实。但是魔法思维逆转了这种关系，认为是人的行为和意志改变了现实。模型则代表了以一种有形的方式来再现难以捉摸的宇宙秩序的愿望，模型是可理解的，因为它为人所建构。同⑮：285-292.

⑲ 韦瑟利在移居英国后与两位阐释学哲学家保罗·利科 (Paul Ricœur) 和伽达默尔有密切的交流，但是在《分裂再现》一书中却几乎没有直接引用他们的概念。相比之下，佩雷兹-戈麦兹、林奇则直接讨论两者的关联性，尤见佩雷兹-戈麦兹讨论建筑学的任务和利科的占有 (appropriation) 与远化 (distanciation) 的关系，Pérez-Gómez A. Hermeneutics as Architectural

Discourse[J]. Cloud-Cukoo-La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97 (2). 以及林奇定义自己的建筑设计的理念和目标——“摹仿建筑”一时对伽达默尔、利科概念的引用。Lynch P, Carl P, Evans L, et al. Mimesis: Lynch Architects[M]. London: Artifice books on architecture, 2015.

⑳ 除了书中的讨论，尤见韦瑟利为他的几篇文章所拟定的标题，如 Vesely D. The Latent Ground of the Natural World: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cative role of architecture[C] HK Heritage Museum, 2005. 以及 Vesely D. The Communicative, (Latent) World of Architecture[C] Kyoto Seika University, Japan, 2009.

㉑ 见 Jencks C.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M]. New York: Rizzoli, 1977.

㉒ 见 Frampton K. The Status of Man and the Status of his Objects: A Reading of 'The Human Condition. [M] // Hill M A, ed. Hannah Arendt: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101-130.

㉓ 对建筑学中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和新马克思主义间关联性的讨论，可见 Otero-Pailos J. Architecture's Historical Turn: Phenomen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Postmodern[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㉔ 这些术语包括如“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具体化”(reification) 等。同时韦瑟利还将这些文本引入自己在埃塞克斯和剑桥研讨课的阅读材料中。见 Bedford, Joseph Thomas. Creativity's Shadow: Dalibor Vesely, Phenomenology and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1968-1989) [D].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8: 225-226. 弗兰姆普敦在韦瑟利逝世后的纪念研讨会上回忆了在发展自己的理论和话语过程中韦瑟利对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推荐他去阅读利科的文本。

㉕ 因其犹太人的身份，胡塞尔在晚年时期受到了纳粹的控制和压迫，他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作为胡塞尔的学生，帕托什卡继承了某种政治传统和宿命，他毕生的哲学事业都是在极权的压制下完成的。从二战到冷战，他大部分时间被禁止授课和出版书籍，只能借助组织地下研讨班和地下出版物来传播观点。他将自己的生活与哲学和政治斗争相统一，推进捷克的民主化进程。他是《七七宪章》(Charta 77) 的3位发言人之一，最后因秘密警察的高压审讯和迫害脑溢血身亡。

㉖ 从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案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开始，这些规划法案让政府能在几乎没有调研、咨询和社区参与的情况下大规模地征收和建设土地，规划交通和基础设施路线。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 政府在1960年代鼓吹将数学建模与住区规划结合加剧了技术官僚主义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㉗ 见 Frampton K. Critical Regionalism[J]. Perspecta: The Yale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 (1983): 147-162.

㉘ 关于局部独立主义可见詹克斯和西尔维的合著的宣言：Jencks C, Silver N. Adhocism: The Case for Improvisation[M]. MIT Press, 2013. 1972年初版。

㉙ 见 Jencks C. The Story of Post-Modernism: Five Decades of The Ironic, Iconic and Critical In Architecture[M]. John Wiley

& Sons, 2012.

⑩ 韦瑟利提出借鉴超现实主义艺术，强调要以半直觉化的方式，通过碎片要素组合来发掘其间潜在的联系和新的意义，即超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客观机遇”（objective chance）的方法。在《分裂再现》的论述中，韦瑟利认为勒·柯布西耶的屋顶平台虽然意义丰富，却是有意识、基于逻辑思考的设计，所以它不是最理想的例子。对于“客观机遇”和超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讨论，参见 Vesely D. Surrealism and the Latent World of Creativity[J]. *Umeni/Art*, 2011 (59) : 267-273.

⑪ 可参见诺伯舒兹的《场所精神》和霍尔一系列的建筑作品集，如《锚》，其中图解和照片优先于文字。尤见前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历史理论专著的区别，诺伯舒兹在此书中省略了对于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更多只是描述表面的视觉印象，辅以大量的配图使其更加强烈直观，同时也暗示了仅通过表面的感官直觉就能把握场所的本质。

⑫ 此种现象学以早期胡塞尔现象学为代表，他所主张的经由现象学还原而除去了自然态度的“直观”实际上依然受制于个人的背景经验。现象学一阐释学意义上的公共性来自于借由复数的主观和相对性的“融合”所实现的“相对客观”，总是依赖一定的语境。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霍尔虽然标榜自己的作品基于现象学的思想，但是其形式却难以在公众中获得共鸣。

⑬ 韦瑟利在《分裂再现》书中最后部分讨论建筑的诗性采用的例子是他在伦敦建筑学院（AA）的学生佩里（Eric Parry）设计的一个普通的商业建筑。韦瑟利的用意是想要说明即使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着追求诗意的可能，但这一例子并不出彩。相比之下，阐释学派的另一位建筑师，卡尔的学生林奇（Patrick Lynch）的作品也许更加能够代表韦瑟利所主张的价值观和方法。林奇以“摹仿建筑”作为自己的建筑设计的理念和目标，他的湿地景观（Marsh View）度假别墅、茜红画廊公寓（Madder Gallery & Apartment EC1）和在建的维多利亚街图书馆（Victoria Street Library）综合体等作品都很好地平衡了对既有参考的继承和想象创造的诗意之间的张力。可参考 Lynch P, Carl P, Evans L, et al. *Mimesis: Lynch Architects*[M]. 2015.

参考文献

- [1] 孙周兴. 试论一种总体阐释学的任务[J]. *哲学研究*, 2020(4) 20-27.
- [2] Bedford J. *Being Underground: Dalibor Vesely, Phenomenology and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rchitecture's Turn to History, 1970-1990*[C]. //

Moravanszky A, Lange T, ed. Re-framing Identities: Architecture's Turn to History, 1970-1990. Vol. 3.: East West Central re-building Europe 1950-1990. Basel: Birkhäuser, 2016: 89-104.

[3] Bedford J. *Creativity's Shadow: Dalibor Vesely, Phenomenology and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1968-1989)* [D].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8.

[4] Frampton K. *The Status of Man and the Status of his Objects: A Reading of 'The Human Condition'*. [M] // Hill M A, ed. Hannah Arendt: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101-130.

[5] Frampton K. *Critical Regionalism*[J]. *Perspecta: The Yale Architectural Journal*, 1983 (20) : 147-162.

[6] Jencks C.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M]. New York: Rizzoli, 1977.

[7] Jencks C, Silver N. *Adhocism: The Case for Improvisation*[M]. MIT Press, 2013.

[8] Jencks C. *The story of post-modernism: Five decades of the ironic, iconic and critical in architecture*[M]. John Wiley & Sons, 2012.

[9] Leatherbarrow D. *Dalibor Vesely: (1934-2015)* [J]. *Architectur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5 (1) : 9-11.

[10] Lynch P, Carl P, Evans L, et al. *Mimesis: Lynch Architects*[M]. London: Artifice books on architecture, 2015.

[11] Otero-Pailos J. *Architecture's Historical Turn: Phenomen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Postmodern*[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12] Pérez-Gómez A. *Hermeneutics as architectural discourse*[J]. *Cloud-Cukoo-La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97 (2) .

[13] Vesely D.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Divided Representation: The Question of Creativity in the Shadow of Production*[M]. MIT Press, 2004.

[14] Vesely D. *Architecture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M]. // *The Humanitie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Bandyopadhyay S, et al., ed. Routledge, 2010: 211-222.

[15] Vesely D. *Doslov*[M]. // Ragon M. *Kde Budeme Zit Zitra*. Smetanova V, Fronta M, trans. 1967: 159-171.

[16] Vesely D. *Surrealism and the Latent World of Creativity*[J]. *Umeni/Art*, 2011 (59) : 267-273.

[17] Vesely D. *The Latent Ground of the Natural World: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cative role of architecture*[C] HK Heritage Museum, 2005.

[18] Vesely D. *The Latent World of Architecture: Selected Essays* [C]. Stara A, Carl P, ed. Taylor & Francis, 2022.